

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

1927年，鲁迅来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过一段时间，又曾到香港讲演三天，前后不到九个月。这段时间虽短，却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是鲁迅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其间的有关史实，无不直接影响到对鲁迅思想生平的理解和评价，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山大学中文系
学术文丛

李伟江 ◆ 著



张钊贻 李 桃 编



岳麓書社

中山大学中文系
学术文丛

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

李伟江◆著
张钊贻
李桃 编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李伟江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7

ISBN 978-7-80665-864-2

I. 鲁... II. 李... III. 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5322 号

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

李伟江/著

张钊贻 李 桃/编

责任编辑:王德亚

特邀编辑:李传书

封面设计:山和水工作室 刘 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9.75

字数:270 千字 印数:1—3,000

ISBN 978-7-80665-864-2/I·781

定价:25.00 元

承印: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井湾路 4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伟江同志生前嘱我为《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写序，于我，是义不容辞的事。

我和伟江认识在四十年前。一九六一年，我和瞿光熙同志合编的《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不久，便接到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李伟江的来信。原来，他在图书馆借阅了《编目》，作了详细的读书笔记，觉得该书对冯铿早期的作品搜集得还不够丰富，便千方百计搜寻冯铿中学时代发表过的诗文，终于在中山图书馆发现了一九二五年间汕头友联中学出版的《友联期刊》第四、五两期，内刊冯铿诗文二十一篇，于是伟江主动给我来信。我深感一个大学生能有这样的钻劲，很难得。我给他回了信，表示感谢和鼓励，从此开始了我们将近四十年的交往和通信。

伟江一直保存着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我的书信八封，而伟江给我的书信却在“文革”中抄家丢失了。我看到伟江的女儿李桃为我复印来的、我用毛笔字写的八封书信，令我惊喜，令我感动。近年我因老伴逝世，整理杂物，也清理出一九七七至一九九三年间伟江给我的十三封书信。这些来往书信寄托着我们近四十年的友情，相互切磋研究有关冯铿、殷夫、毕磊、山上正义等人的史料，当然主要是围绕着鲁迅在广州的史事。这些在伟江这本遗著中都有所反映。

后来伟江在冯铿选集《重新起来》的编后记中，还念念不忘提到《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对他走上新文学史科学研究之路的影



响。自此，伟江的确打开了“史料仓库的大门”，并养成了“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终于成为全国鲁迅史实研究“劲旅”中的一员。他对新文学史料学的贡献，诸如《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与人合编）、《创造社资料》（与人合编）、《冯乃超研究资料》，还有《洪灵菲文集》等等，都是卓有成就的。

伟江在七十年代开始专注研究“鲁迅在广东”的问题。一九七五年，鲁迅佚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的发现，自然有伟江的一份功劳。翌年，伟江借调到北京鲁迅博物馆鲁研室一年，参加注释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主要是《而已集》）的工作。自此之后，他对鲁迅在广东时期史料的搜集和史实的考订，更加积极和深入，默默耕耘，孜孜不倦。伟江的力作《鲁迅与毕磊》、《鲁迅与〈少年先锋〉》即是交我发表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上，而他多年考订的《鲁迅赴港讲演始末考》遗作经李桃继承父业，整理完成，发表在《鲁迅世界》二〇〇一年三、四期合刊，自是伟江留世的扛鼎之作。

《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是伟江二十多年来研究的成果，这是一本史料翔实、考订细密的书，也是研究“鲁迅在广东”的第一本学术性著作，却一直没有机会出版，现在书总算面世了，虽然人已作古，还是很值得欣慰的。

史料搜集和史实考订是一种硬功夫，正因其硬，要求严谨扎实，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对研究者来说，这种工作要甘于寂寞，埋头苦干；对读者来说，除了专业同行之外，这种著作未免过于专门，枯燥无味。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跟王保林同志合作考订《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他》一书，交稿后经过十多年才出成，没有稿费，只印五百本作酬，由作者送赠友好和研究机构，坊间概不出售，可说也是一个例证。

我也是从事史料搜集和史实考订的，说来也许有点敝帚自珍。史料工作是脚踏实地科学研究的基础，为学术研究添砖加瓦。明白这一道理的研究者，自然不计较其间的冷遇和误解，因为里面自有它庄严的东西，即鲁迅先生所谓的“傻”。世间的学术却是一批一批的“傻子”

奋力开拓着。而伟江就是这种“傻子”之一。

我极感谢支持本书出版的“傻”劲。不过,我想指出一点,本书留给我们的,不光是具体考订的事实;在那些“烦琐”、繁杂、令人烦恼的纠缠不清的麻烦事的背后,还留下了伟江辛勤地为学术研究添一砖一木的“傻劲”,和他肯做硬功夫的“硬骨头”精神,这对那些依然在默默耕耘着的“傻子”,也不失为一种宽慰和鼓舞吧。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鲁迅研究界诸友好、以及伟江的亲人李桃、张钊贻和我等合力以梓行伟江这本《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为远行的伟江同志送上一份铭感于心的奠礼!

丁景唐

二〇〇三年初于上海慎舍



序





去年十月底，我去梅州出席纪念李金发诞生一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北京、武汉等地许多诗歌研究名家都来了。中山大学的李伟江教授掌握大量李金发的资料，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正准备出版李的全集。他是广东方面最应该出席这次会议的，可惜因病缺席。等到十一月三日我回到广州时，李伟江教授已于一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留下了一大堆未竟的、无人可以替代之业，留下了无限的遗憾。

一九八七年，我只身来到中山大学，系里分给我的住房正与李先生的家隔楼相望，我的窗口正好对着他的书房。我常常在深夜看到他的书房还亮着灯。广州这地方楼距太近，夜里从窗口看对面的楼，恰似迎面立着的一块黑魆魆的大黑板，独有李先生的窗子亮着，好像老师下课没有擦掉的几个粉笔字，保留着一个思考的成果。我想，原来这里也有这样苦读的人。

大约一周后，我和李先生一起去成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初次交谈，知道他是研究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是国内高校最早开设此课者之一。我知道这是项很艰苦的工作，但又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尤其在学风比较浮躁的地方，肯于淡泊名利，埋下头来，大海捞针似的从一条一条资料的搜集做起，真不容易。就在成都他找到冯乃超的一篇千字文，图书馆要价三十元才让复印（这在当时算是高价），他踌躇了一阵还是咬咬牙掏了腰包。我对他的工作表示钦佩。他似乎不相信我，嘟哝着说：“你是这样看的？”我明确回答：“当然！我认为实证的方法应

该是做学问的基本功！”他有点信了，舒了一口气说：“噢！原来这样。我们这里可听不到这样的声音！”此后我们在治学上便有了许多共同语言，我欣喜地看到他在岭南新文学运动和粤籍作家研究上，持之以恒地勤搜苦求，做了许多辨伪、探佚、考订的工作，得出坚实牢固的结论。我敢说在这些方面，我们都远不如他，以至他走后便无人继承了！

例如过去研究鲁迅思想，爱用一条“鲁迅语录”：“共产党是火车头。”见于鲁迅在上海与日本学者增田涉的谈话，是鲁迅拥护中共的有力证据。后来有人把记载此话的增田涉的书译了过来，才知道原来鲁迅是说：原先国民党说“共产党是火车头”，不久便翻过脸来杀共产党。这是揭露国民党的，把国民党的话栽到鲁迅头上，其谬大矣。但鲁迅是实指还是泛论，国民党内真有人这么说过吗？经过李先生审慎细密的考证，找到史料证实此话是戴季陶说的，把说话的时间、场合都查清楚了，证据确凿。我以为就是这一条考证，其价值也胜于长篇累牍的许多泡沫文章。这才叫真学问。所以李先生在广州似乎名声不大，在国内同行中却颇有口碑。许多同行学者从远方来信向李先生请教，他都热心诚恳地帮助订正错漏，被北京一位著名的鲁迅专家称为“很厉害的学者”。

做学问和做人，实有许多一致性。李先生肯于默默地耕耘，做这种付出与回报极不相称的“亏本”工作，实与他十分朴素的生活作风有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李先生曾被借调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下了火车他用扁担挑着自己的行李去报到。“鲁博”的人大吃一惊，原以为广州人一定西装革履，华侨模样，来人却直如“乡下佬”。我与李先生相交十余年，也看不到他在物欲上有什么追求。虽然大家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的日子始终是清淡的。但他的工作作风却一贯地特别认真执着，正和他写文章一样。有一年他辅导一位学生做论文，那学生抄袭了某名家的文章。李先生认真查对，令其重做。这位学生恶习难改，又到某师专的学报上抄了一篇，自以为出处偏僻不易被发现。岂知又被李先生查对出来了，这回不客气地给了零分。这种不讲情面的作风竟使有的学生从此不敢请李先生辅导了。然而他对学生



绝非无情。有一阵做了班主任,这对有的教师,只是挂个名而已,他却事事负责到底。学校开运动会,他亲自到运动场为班上学生鼓劲,还把太太女儿也带去,给学生倒茶递水。到了学生毕业时,他又帮助求职,汗流浹背地东奔西走,不知花去多少时间,他只觉得自己分内的事。他也非常慷慨热情地让我的学生查阅、抄录他收存的资料,因为书房太小,学生们就坐在门外阅读、抄写。

李先生虽为教授,但并无显赫的名声。他的辛苦考索之功,不合虚夸为上的时潮,因而不大被人注意。一个严谨到文章要字字有来历的人,更不懂得虚张声势地自我吹嘘,他的头上便没有迷人的光圈。他只会默默地做,默默地前行,最后默默地走了。但我绝对相信支撑我们的事业,推动学术进步的,就是像李先生这样默默地却是实实在在耕耘者。这才是靠得住的,可信赖的,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人!李先生走了整一年了,他的形象正渐渐地淡去,但我却始终怀念他。这怀念也几近于默默的,却是深镌于心的!

黄修己

附识:此文原载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羊城晚报·花地》,题为《默默的,深镌于心的……——怀念李伟江教授》,今权作代序。

“鲁迅在广东”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自从一九二七年一月鲁迅来到广州,便有了“鲁迅在广东”的研究,至今已有六十八年历史了。就地域性和时期性而言,“鲁迅在广东”是鲁迅研究中做得较充分、较有成绩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深化研究,扩大成果,需要作一番总结和改革。

一 研究阶段及成果

关于“鲁迅在广东”的研究,迄今已发表有关文章及资料五六百篇。其中,专集已出版七本,计有: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北新书局一九二七年七月初版),曾敏之著《鲁迅在广州的日子》(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九月初版),中山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十月印行),张竞著《鲁迅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初版),山东师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鲁迅在广州》(聊城印刷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印行),韦工编写《鲁迅在广东的战斗》(《广东青年》一九七六年五月至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连载),李伟江、饶鸿竞、吴宏聪编写《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鲁迅在广州》(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四月初版)。

另外,出版连环画五套:广州鲁迅纪念馆编绘的《鲁迅在广州》(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一月初版),中山大学中文系编、汤小铭绘的彩色连环画《鲁迅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十月初



版),诸镇南编、温尚光、张大渊绘的《在战斗中前进——鲁迅在广州》(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初版),浙江话剧团创作演出,曹震云、张颖、谢新发摄影剧照连环画《梦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六月初版),童汀苗改编、赵延年木刻连环画《梦幻》(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月初版)。

此外,还发表演播剧本四种:张庆仁作广播剧《鲁迅在广州》(一九七九年五月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童汀苗(执笔)、骆可作六场话剧《梦幻》(载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杭州《东海》月刊第十二期);刘树纲作七场话剧《南国行》(载一九七七年十月北京《十月》文艺丛刊第四期);纪乃咸、薛宝根作七场越剧《鲁迅在广州》(载一九八一年八月上海《新剧作》双月刊第四期)。

“鲁迅在广东”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六个阶段,每段各有成果。

一、一九二七年为勃兴期。

鲁迅来广州前后引起南国青年的巨大关注,立刻掀起了一股“鲁迅热”。发文章,开大会,作访问,约写稿,请撰序,邀讲演,忙个不停,热闹了好大一阵子。丁卜书店和受匡书店出现了《阿Q正传》的写真本(刻写油印本),销售达三四千本之多;《文潮》杂志封面上印着鲁迅的题签,有人连“鲁迅的胡须”也研究起来了。

据统计,一九二七年间发表有关鲁迅在广州的文章、报道超过七十篇。其中不少虽属随感、应酬之作,但也不乏有见地的论文及珍贵的原始材料。第一本专集——钟敬文编的《鲁迅在广东》也应时而出。该书收入有关鲁迅的文章,或欢迎、或记述、或评论,总共十二篇,还附录鲁迅的讲演四篇。其中最重要的是景宋的《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一声的《第三样世界的创造——我们所应当欢迎的鲁迅》,坚如的《欢迎了鲁迅以后——广州青年的同学(尤其是中大的)负起文艺的使命来》,以及鲁迅讲、林霖记的《读书与革命》。第一篇是鲁迅授意许广平执笔,回答宋云彬等广州青年诘问的,当中保留一些鲁迅对广州看法的原话;第二篇是刘一声受中共广州地委委托,首次对鲁迅的



杂文作出崇高评价，甚至认为它对革命文化运动的贡献超过了小说；第三篇是毕磊代表广东学委会，对广州青年学生寄予深切的期望，文中保留不少鲁迅在欢迎会上讲话的意见；第四篇是鲁迅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演词，经鲁迅“亲自校阅过”，为《鲁迅全集》所未收。

鲁迅对该书多次表示不满，原因是鲁迅对编者的身份有些误解，而此书编集时又没有征求鲁迅意见，甚至在广告上写成“鲁迅著”。平心而论，该书在保存历史资料方面，仍有其不灭的价值。总之，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今后研究“鲁迅在广东”打下了初步基础。

二、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年为沉寂期。

从一九二八年至鲁迅逝世，专题文章几成空白，仅见一篇，即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上海《时代报·天问》发表老秀的《鲁迅的轮廓画》。文章记述了作者当年在广州与鲁迅的对话，弥足珍贵。

鲁迅逝世之后，曾出现了一批回忆文章，当中少数也有专门忆述鲁迅在广州的。例如清水的《我忆念到鲁迅先生》，从学生的角度回忆了鲁迅来中山大学前后的情景及欢迎会上的实况，颇为详尽；黎锦明的《两次访钟楼》，记述了当年大钟楼的布局和鲁迅初到广州的观感，也很生动；许寿裳的《广州同住》，以同乡、同学、同事、同住的身份，提供了有关鲁迅在广州的思想、言行、起居、交游、写作等方面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尸一（梁式）的《可记的旧事》，回忆了当时国民党对鲁迅的“拉，捧，打”。

在沉寂中，林辰的《鲁迅在中山大学——鲁迅生涯之分期的研究》，可称空谷足音。该文刊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重庆《抗战文艺》月刊第九卷第三、四期合刊，分“赴粤的经过”、“在钟楼上”、“辞职以后”三节，为这个论题的研究开了先河，是第一篇有分量的文章。王士菁的《鲁迅传》，由三联书店一九四七年六月初版，是国内第一本鲁迅传记，其中也有章节记述鲁迅在广州。这个漫长的阶段是在战乱、苦难中度过的，它预示着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诞生。

三、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为恢复期。

共和国的成立,给“鲁迅在广东”的研究带来勃勃生机;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又把此项研究引向深入。五十年代中后期建立了广州鲁迅纪念馆及中山大学鲁迅纪念室,陆续有一批回忆及研究文章涌现。

何春才的《鲁迅在广州的生活点滴》、宋云彬的《回忆鲁迅在广州》,都是有意义的亲历记。香港一些报刊,也发表了此类文章。陈则光的《鲁迅先生在广州》,载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文艺报》第二十号“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特辑”,是颇具水平的研究论文。韩托夫的《一个共产党员眼中的鲁迅先生》,载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文艺报》第十九号“鲁迅纪念专号”,首次提出鲁迅在广东与共产党的亲密关系。伍木(徐彬如)的《办好更多的革命纪念馆 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服务》、许广平的《厦门和广州》,进而指明鲁迅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在区委会秘密会见。这是“鲁迅在广东”研究中的重大突破。同时,曾敏之著的《鲁迅在广州的日子》也出版了,此书共四章,附录两篇。作者以散文笔调,描述了鲁迅南来北往的情景,在广州生活和斗争的风貌,写得亲切感人;但该书内容尚嫌单薄,材料不够新,且有不少失实之处,殊为可惜。整体来说,这个阶段的恢复工作是成绩斐然的。

四、一九六一至一九七六年为迂回期。

上海电影局及天马电影制片厂为拍摄电影《鲁迅》,成立了《鲁迅》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组,该组资料人员多次访问了鲁迅在广州时期的当事人和知情者徐文雅(彬如)、韩财元(托夫)、罗西(欧阳山)等人,查阅了一些当年出版的有关报刊,掌握了一批当年广州的派系斗争以及鲁迅与党的血肉关系的珍贵材料。而后由沈鹏年整理成长文《鲁迅在广州时期的若干史实》,连载于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光明日报》。该文包括三大部分:鲁迅赴粤因缘——党的推



荐,围绕“欢迎鲁迅”问题上的斗争,鲁迅和党的关系(内容包括鲁迅和毕磊、鲁迅对党的事业的支持、毕磊的牺牲和鲁迅的悼念、陈延年离粤前后有关鲁迅的几次谈话)。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鲁迅在广东”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有组织地研究鲁迅在广东与共产党亲密关系的新阶段。然而,由于事隔多年,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回忆难免不够准确,几人的回忆也有互相矛盾之处;一些关键性的史料,缺乏必要的旁证,影响了信服力;更由于整理者的学风不正,掺沙进水,真真假假,使文章带有不少杂质和水分。

此外,沈鹏飞的《忆鲁迅先生在中大二三事》,是有价值的回忆文字;以群的《鲁迅在广州》,是有质量的研究成果。

不久,“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开始,这些成果不仅没有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且研究也被引入歧途。“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石一歌”的《鲁迅在广州》(载一九七三年五月上海文艺丛刊第一辑《朝霞》)和《伟大的飞跃》(载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海《学习与批判》月刊第十一期)等文,最具代表性。他们除袭用沈鹏年的虚假材料外,还涂抹上一层浓重的“左”倾色彩。

不过,这项研究还是艰难曲折地进行着。广州鲁迅纪念馆扎扎实实地做了大量的调查访问工作,抢救并整理了许多活的第一手材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少新史料。中山大学负责注释《而已集》,艰苦挖掘和整理史料,发现了鲁迅的重要佚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引起了鲁迅思想发展的论争。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成立了广东鲁迅研究小组,着手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同年十月北京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发表了许广平的《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和徐彬如的《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都是极其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同年十月二十日《历史研究》第五期,发表了翰若(许涤新)的《鲁迅战斗在广州》,也很值得重视。总之,这个阶段虽受挫折,仍旧迂回前进。

五、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四年为繁荣期。

粉碎“四人帮”后,这项研究也得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陆续发表有关文章百篇以上。一九七八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成立了鲁迅研究室(一九八二年改为现代文学研究室),开展了研究工作。许杰的《回忆我和鲁迅先生的一次见面》(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六月初版《鲁迅回忆录》第二集),忆述了鲁迅对《唐宋传奇集·序例》末尾“时大夜弥天……”四句的解释是“有意刺高长虹的”,并非如“石一歌”所瞎猜胡说的那样。卞立强及李芒(李连庆)把增田涉的《鲁迅传》及山上正义的《谈鲁迅》、《鲁迅的死和广州的回忆》译成中文(均载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鲁迅研究资料》第二辑),校正了梁成、范泉等人的误译,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史料。李江根据新的译文,查考了各种历史资料,找到《戴季陶先生在中山大学第二次演说词》,写成《关于“共产党是火车头……”一段话的由来》及其《补充》,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上,论证了这段话并非鲁迅所言,而是戴季陶在伪装革命时所说的,从而纠正了半个世纪以来的讹传。李江又根据《中国青年》、《人民周刊》、《少年先锋》、《做什么?》等文献资料及调查访问所得,写成长文《鲁迅与毕磊》(载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鲁迅在广州时期革命报刊宣传马列主义的情况及对他的影响》(载一九八〇年五月《鲁迅研究资料》第五辑),用具体典型的人和事,从鲁迅与共产党、鲁迅与马列主义的角度进行探讨,深化和拓展了这个研究领域。一些研究者还对鲁迅在广东的作品及思想作了初步的整体研究,袁良骏的《读〈而已集〉——兼谈鲁迅世界观的转变问题》、金钦俊的《从〈而已集〉》等著作看鲁迅广州时期的世界观,就是这方面的成果。

广东鲁迅研究小组还举行了几次学术研讨会,着重讨论了这个课题,并编印了《鲁迅思想发展问题讨论集》、《鲁迅研究资料选编》、《鲁迅和我们同在》、《论鲁迅在广州》、《鲁迅诞辰百年文集》(上、下册)、《诚挚的纪念》等集子,都专门或兼及探讨了“鲁迅在广东”这个



研究课题。一批很有价值的回忆录和论文也应运而生，如欧阳山的《南中国文学会及其它》、林楚君（长兴）的《鲁迅热切关怀文艺青年——记鲁迅与“南中国文学会”青年的一次会见》、冯慕韩的《往事杂忆——鲁迅先生与广州新文学运动（片断）》，以及何思源的《回忆鲁迅先生在中山大学情况》、黄巽的《回忆鲁迅“四·一五”前后在中山大学》、周鼎培的《回忆中山大学“紧急会议”情况》等，详述了鲁迅对“南中国文学会”的关怀指导，并亲自召集和主持“紧急会议”的具体实况。值得一提的是，《南开学报》哲社版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发表了陈漱渝、张铁荣的《关于鲁迅广州时期的研究》（后易题《鲁迅广州时期研究状况述评》），开创了鲁迅地域研究史的先河。

这个阶段，还出版、印行了几本专集。张竞著的《鲁迅在广州》是可喜的收获。作者长期从事鲁迅纪念馆的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接触了众多的当事人和知情者，积累了丰富的书面和口头资料。本书材料新颖翔实，图文并茂，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是一本颇具特色的阶段性传记。但当时难免受到某些“左”倾思潮的影响，过分强调鲁迅作为战士、革命家的“坚持战斗”、“英勇不屈”、“永远进击”的一面，而比较忽视鲁迅作为教师、文学家的另一面。同时，作者重访问材料而轻文献史料，或仅凭印象写出而未查核史料，因而也有若干史实不确之处。李伟江、饶鸿竞、吴宏聪编写的《鲁迅在广州》，编入《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是注释《而已集》的副产品，也是此前印行的《鲁迅在广州》的改编本。本书着重收集当年发表或存档的原始材料，对回忆材料和调查材料的选择相当严格，并作订正，图片比较丰富，且加附录，可以说是目前最完备的一本“鲁迅在广东”的资料集。但限于篇幅和见闻，仍存遗珠之憾，而且也有小错。增订本编好因缺乏经费而未能出版。

这段期间，还出版了《民族魂》、《鲁迅传略》、《鲁迅传》、《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等十余种史籍，也都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对“鲁迅在广东”作了专门评述，因篇幅有限，恕不一一列举。可见这个阶段的研究确是繁荣昌盛的。